

世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丛书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fer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二语学习中的迁移新视角

俞理明
Terence Odlin (美)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fer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二语学习中的迁移新视角

俞 理 明
Terence Odlin (美)

编

京权图字：01-2018-0100

© Liming Yu and Terrence Odlin (2015)

This edition of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fer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ultilingual Matters and is for sale only in the following territory: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语学习中的迁移新视角：英文 / 俞理明, (美) 特伦斯·奥德林 (Terrence Odlin) 编. —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1

(世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135-9891-0

I. ①二… II. ①俞… ②特… III. ①第二语言—语言学习—研究—英文
IV. ①H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28878 号

出版人 徐建忠
责任编辑 毕 争
责任校对 解碧琰
封面设计 贾世旭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0.5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5-9891-0
定 价 75.90 元

购书咨询：(010) 88819926 电子邮箱：club@fltrp.com

外研书店：<https://waiyants.tmall.com>

凡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联系我社印制部

联系电话：(010) 61207896 电子邮箱：zhijian@fltrp.com

凡侵权、盗版书籍线索，请联系我社法律事务部

举报电话：(010) 88817519 电子邮箱：banquan@fltrp.com

法律顾问：立方律师事务所 刘旭东律师

中咨律师事务所 殷 斌律师

物料号：298910001

导读

1. 我的语言迁移研究之路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fer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二语学习中的迁移新视角》) (Yu & Odlin, 2016) 是 Multilingual Matters 出版社 2015 年 10 月推出的“第二语言习得”系列丛书中的第 92 本。此书自 2016 年问世以来,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得到了不少好评(李佳、蔡金亭, 2016; Lei & Xu, 2017)。我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从事迁移研究的,屈指算来,已有 30 年了。那时, Terence Odlin 是我心目中偶像级的学者,今天和他合作出书,抚今思昔,心潮澎湃,难以平息。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和读者分享自己从事语言习得研究的学术经历和心得体会,同时也算是本书的导读。

1988 年 1 月,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简称为 OISE) 课程系现代语言中心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鉴于我长期将英语作为外语进行学习和教学,积累了一些经验,自然对母语对成人外语(二语)学习的作用感兴趣,就这样我走上了语言迁移研究这条学术道路。彼时,二语习得领域早已完成从对比分析假设 (contrastive analysis hypothesis) 到中介语假设 (interlanguage hypothesis) 的研究范式的转型 (paradigm shift),而语言迁移研究受到了空前的冷遇之后,又开始复苏起来。即便如此,当时一些学者为了“避嫌”,主张使用“语间影响”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¹

1 参见: Kellerman & Sharwood Smith (1986)。

这一所谓“中性”术语来取代“语言迁移”。就在这个时候，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 Terene Odlin 的专著《语言迁移：语言学习中的跨语言影响》（*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正式出版（Odlin, 1989）。Odlin 在这本著作里，不仅把“语言迁移”这个当时还颇具争议的术语定为自己的书名，而且针对学界“语言迁移”众说纷纭的乱象¹，给出自己的定义：“迁移是目标语和任何一种已经习得的语言（也许还没有完全习得的语言）之间的共性或差异所造成的影响”（1989：27）。虽然 Odlin 出于谦虚把它称为“工作定义”（working definition），但就笔者所闻，这一定义问世至今 30 年，还没有受到任何学者的挑战。换言之，学界对迁移是什么的认识从此就“定于一尊”了。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 Birgit Harley 敏锐的学术眼光。她在 Odlin 的专著出版不久，就向我推荐此书；这部著作从此成为我博士论文的灵感源泉。Odlin 指出，语间影响不仅由语间差异引起，也可以由语间共性造成，而语间共性起的是正面作用。但就我而言，学习英语伊始，老师就耳提面命，不要受自己母语汉语的影响。长此以往，我一直以为母语影响就是负面影响。为了探索语间共性的作用，我把英、汉语言词汇共性的作用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

毋庸赘言，英、汉词汇在拼写、发音等方面是没有什么共同性可言的，但根据 Talmy（1985, 2000），英语和汉语同属于卫星框架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²，在表达运动事件（motion event）上采用共同

1 S. Gass 和 L. Selinker 在 1983 年出版了（1992 年又出了修订版）《语言学习中的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 in Language Learning*）。根据这本书的不完全统计，语言迁移可以列出的定义有 17 个之多。参见 Dechert & Raupach（1989）。

2 在 Talmy 提出的可以分成卫星框架语言和动词框架（verb-framed）语言之后，Slobin（1996, 2000）对 Talmy 的二分法提出小小修正，认为除这两大类外，还存在均等框架（equipollently-equipped）语言，而汉语属于这一类语言。这个讨论已经不在本文范围之内，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相关文献。

的词汇化模式 (lexicalization pattern)¹。这里还需要着重指出, 这种共同的词汇化模式反映了卫星框架语言的本族语者对运动事件具有共同的观察角度和思维习惯。这种词汇共性实际上已经不仅仅局限在语言层面, 而且也与非语言 (或超语言) 的所谓 (语言) 底层概念表征 (underlying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有关。我的实证研究数据说明, 和不属于卫星框架的日语学生相比, 同样英语水准的中国学生在英语运动动词使用上更胜一筹, 因而证明了外语学习者能从“语言类型不相关的本族语和目标语之间的语间词汇共性中受益” (Yu, 1996 a)。后来, 我的博士论文中的一些研究成果正式发表 (Yu, 1996 b), 引起了 Odlin 的浓厚兴趣。他特意通过大学图书馆借阅我的博士论文, 并在他以后的不少论文里提及我的研究 (Odlin, 2008)。

1996 年回国后, 我到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工作。我发现国内外语言界对语言迁移的研究了解甚少, 除了一些学术论文多少提及之外, 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讨尚付阙如。这就引发我撰写了《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回顾、反思和研究》这部专著 (俞理明, 2004)。这本书虽然可以算得上是国内第一部系统介绍和评析二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研究的发展进程的专著, 但这个“发展历程”只覆盖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而这以后语言迁移研究又有了重大进展, 成果累累, 于是我萌生再写一本能全方位涵盖语言迁移研究最具前沿成果的专著的想法, 以供国内语言习得界同仁参考。为此目的, 我成功申请到了一项上海交通大学 985 工程二期项目, 并参加了在 2009 年 3 月 21 日召开的语言迁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次会上, 有幸结识到我仰慕已久但从未谋面的 Odlin 教授。

通过和国内外语言迁移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和其他学界同仁们的交流, 我的视野得以大大拓展, 对语言迁移研究的前沿发展也有了更深刻的

1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拙著《语言迁移与二语习得——回顾、反思和研究》(2004), 进一步详细了解作为卫星框架语言的英、汉语在运动事件表达上的词汇化模式。

理解。国际研讨会之后,我和常辉、姜孟¹合著出版了《语言迁移研究新视角》(俞理明等,2012)。这部专著“从各个语言层面以及语言层面的接口,全面、系统地介绍和评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语言习得中语言迁移出现的新视角和新领域,如句法形态、句法语义、句法词汇等语言接口知识的迁移,第二语言初始状态中的迁移、多语习得中的语言迁移、影响语言迁移的因素、语义迁移、语用文化迁移,这些都是以前语言迁移研究没有怎么探讨的,甚至是从来没有讨论过的”(俞理明等,2012:前言)。

2009 年语言迁移国际研讨会后,我产生把我国外语界这方面的学术成果推向国际的想法。于是,我从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挑选出最为优秀的近 10 篇,以此为基础,向 Multilingual Matters 出版社提出选题申请。很幸运,论文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经过 5 年努力,本书于 2016 年完成。下面我来具体介绍本书的主要特色和基本内容。

2. 本书基本内容和主要看点

本书共 13 章,第 1、2 两章为总论。第 3 章至第 12 章为全书的主体,分为 4 部分:词汇(2—5 章)、句法(6—8 章)、语音(9—10 章)和认知层面的迁移(理论或实证)研究(11—12 章),每一部分各章里均有我们的点评。作为全书总结的第 13 章既是对第一章的呼应,又是对 4 个部分各章点评的总结和归纳。下面我想多花点篇幅讨论一下本书中的 4 个视角:历史发展视角、语言特有加工视角、学习心理学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的视角、中国元素和迁移的语境补缺假设视角。

2.1 历史发展视角

历史发展的视角主要体现在第 1、2 两章的总论中。第 1 章是 Odlin

1 常辉和姜孟均是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博士,现二人分别是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和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和我共同撰写的本书的前言。前言除了介绍本书各章外，还以问答的形式对语言迁移的起源、本质、研究方法等这些问题作了总结和归纳。这 5 个问题是：1) 语言迁移是什么？2) 研究者对语言迁移的兴趣起源于何时？3) 如何判定语言迁移现象？4) 语言迁移在二语习得理论中的地位如何？5) 语言学家能否预测迁移何时发生？我们认为，以上 5 个方面的内容是每个从事语言迁移和二语习得研究的学者必须具备的知识。

我这里要特别谈一下第 2 个问题。这是对迁移研究的正本清源。我们发现，近代迁移研究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或稍早一点。英文的“transfer”作为专门术语首先是美国学者 W. Whitney 于 1881 年使用的。随后，另一位美国学者 Elliott (1886) 在其关于加拿大语言接触的著作中也使用了该术语。上述两位学者从事的是西方双语（多语）社会中语言之间相互影响的社会或历史语境研究，他们的迁移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因此，语言迁移研究发端于语言学分支下的接触语言学 (contact linguistics)，而并非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起源于学习心理学。理解这一点对拓宽我们的迁移研究视角，拓展我们的研究思路，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这一点我会在 2.3 节展开讲。

第 2 章作者 Scott Jarvis 是继 Odlin 之后，当前二语迁移研究的又一领军人物。这一章对迁移研究的范围、目标以及方法的阐述高屋建瓴，是当今语言迁移研究不可多得的入门必读篇章。

Jarvis 的探讨也是从追溯迁移研究历史开始的。他重申了早些时候他和 A. Pavlenko 的论述，认为迁移发展经历 4 个阶段。第 1 阶段大致从 19 世纪中期或更早（这和第 1 章的提法是一致的）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至末期，这一阶段将迁移视作一个可解释其他因素的解釋变量 (explanandum) 来研究；第 2 阶段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晚期，延续至今。这一阶段迁移从解释变量变为一个可由一系列因素解释的被解

释变量 (explanantia)；第 3 阶段大致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持续至今。研究者开始提出相关的迁移理论，其理论驱动 (theory-driven) 的特点十分鲜明；第 4 阶段发生在最近的十几年期间，关注点是迁移在大脑中怎样发生以及作出生理上的精确解释 (Jarvis & Pavlenko, 2008: 4-8)。Jarvis 进一步指出，在这 4 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语言迁移研究还经历了研究范式的转变。对迁移影响的认证和量化的研究是主导第一阶段的研究范式，而新的研究范式则表现在如下 3 个方面：解释发生迁移的原因和迁移的制约因素 (第 2 阶段)，把对迁移的解释上升到理论 (第 3 阶段)，描述迁移如何在大脑里发生 (第 4 阶段)。Jarvis 还着重指出，虽然语言迁移研究可以分为上述 4 个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上阶段的所有问题全部解决后，新的阶段才会产生。换言之，在新阶段里还存在着上阶段尚未解决的问题。在 Jarvis 看来，当前语言迁移研究正处在一个“了解”与“解释”的交点上，正在经由第 2 阶段向第 3 阶段过渡。

Jarvis 认为，虽然我们已储备了有关语言迁移的大量知识，但要对语言迁移做出最终的充分解释，依然任重而道远，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可以通过达成 4 个促成目标 (enabling goals)，来实现最终目标。同时，在实现促成目标的同时，可能会产生一些与语言教学、语言诊断和评估以及其他相关的应用语言学成果，这些成果是迁移研究的附带目标 (side goals)。

综上所述，总论两章着眼于把语言迁移从 19 世纪到现在的发展过程的全貌呈现给读者。了解语言迁移起源于接触语言学这一重要历史事实、其 4 个发展阶段及彼此的关系，就能把握好语言迁移研究整体大局和今后的走向。读者应当仔细阅读 Jarvis 对迁移研究的最终目标和促成目标的阐述，了解这些目标的具体内容。这有助于确定自己的研究目标和努力方向。

2.2 语言特有加工视角

“语言特有加工”(language-specific processing)指在习得一种语言的时候,会形成一定的思维习惯或认知加工(cognitive processing)方式,而这种思维习惯和认知加工方式会影响对第二语言的理解和产出。Odlin认为,该术语最早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 Alfonso Caramazza 的著作。笔者与 Odlin 通信时得知他近 5 年来一直运用这一理论来研究二语学习中的迁移问题。我们在第 1 章中指出,关于语言和思维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到了 19 世纪,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洪堡重新探讨了语言和思维的关系(von Humbolt, 1836)。他认为语言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声音和符号,而在于世界观本身。他使用了 hinübertragen 这一术语,该术语可以直译为 over-carry,即把母语知识和母语思维带至新的语言学习和使用中。Jarvis (2007)认为语言使用者已掌握语言的概念和概念化模式会影响正在学习的另一种语言的理解和产出。在本导读第 1 部分提到的我的博士论文中所探讨的英汉词汇共性,实际上就是指同属于卫星框架的英、汉本族语在运动事件中语言特有的认知加工共性。正是这种共性,才有助于中国学生对英语运动动词(motion verb)的理解和产出。

本书中的几个实验提供了二语学习中存在语言特有加工影响的证据。第 4 章作者李佳和蔡金亭观察了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习得 above、over、below、under 这 4 个英语介词中母语负迁移现象。他们的实验和我的博士论文一样,从词汇习得层面上探讨了概念和概念化对二语学习的影响。但不同的是,他们研究的是汉语和英语在表达空间概念时的差异性,而不是共性。他们的实验证明了两种语言不同的语言特有加工方式阻碍了二语词汇的习得。在第 5 章,加拿大学者 T. Sima Paribakht 和 Marjorie Bingham Weshe 的实验发现,虽然以波斯语为母语和以法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都依赖句子的上下文来推断单词的意义,但依赖程度大不相同。

波斯语的书写系统缺少元音，这就限制了以母语为波斯语的学习者利用词汇线索来猜测词义。因此，猜测词义更依赖于范围更广的语篇。而以法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则主要依赖句子和英、法两种文字的书写体系。该研究结果表明，迁移的模式除了受第一语言结构影响外，还受到了第一语言程序性（procedural knowledge）知识的影响。

上述两章从二语词汇习得层面上探讨语言特有的加工，而第9章的作者李红、张磊和周翎讨论的是语音层面上的语言特有加工的影响。他们发现，由于汉语是声调语言，音节之间相差较大。为了标注音节（以便听者能够辨识音调），汉语词语中每个音节重读的程度大体相同。她们认为，这种特有的倾向使以汉语为母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英语语音语调的学习中会遇到巨大的挑战。这是因为英语是语调语言，在语流中音节通常是不断变化的。换句话说，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对声调更加敏感，而对重读与非重读音节的区分能力弱。因此，中国学生在讲英语时，往往会出现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的音长相同或者误用了英语的重音等现象。她们的实验说明了汉语音位加工模式影响了学习者的英语音韵模式的习得，而这种音位上的迁移影响了二语产出。

Odlin 的第11章从认知层面阐述了迁移中的语言特有加工作用。他对比了210名母语为芬兰语和瑞典语的英语学习者的写作后发现，同样的目标语输入（2个英语字幕标题，1长1短），学习者的语言输出却很不相同（复述所看到的字幕）。瑞典语与英语密切相关，而芬兰语与英语不相关。因此，与母语为芬兰语的学习者相比，母语为瑞典语的英语学习者在习得英语中理解力要更有优势，且错误率更低。这里要指出的是，语间共性对目标语习得的促进作用早已被许多实验证明，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但 Odlin 并不就此停步。他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迁移和记忆的关系，明确指出不同的母语背景对记忆产生不同的影响。与母语为芬兰语的学习者相比，母语为瑞典语的英语学习者正是得益于瑞典语和英语

的相似性,从而记住了更多的目标语输入。这也就是说,目标语输入与学习者母语知识的相似性有助于学习者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语间共性能促进目标语习得的原因。Jarvis 在第 2 章指出,目标语加工中迁移和记忆关系的研究代表了当今迁移理论新进展,读者今后应当关注包括 Jarvis 本人在内的相关研究。

以上实验说明,语言特有加工存在于词汇、语音、认知等各个层面。Odlin 在总结(第 13 章)里对否定语言特有加工的“思想的语言(language of thought)”理论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Stevens Pinker (1994)在谈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时认为,人们不用具体的语言(如汉语、英语或阿巴契语等)进行思考,而是用“思想的语言”进行思考。按照 Pinker 的说法,这种“思想的语言”和任何语言都有些相似,但又超出任何一种具体的语言。“思想的语言”否定语言特有思维的存在,已经被本书中的不少实证研究所否定。

Odlin 在批驳“思想的语言”理论的同时,重新回顾了沃尔夫(B. Whorf)提出的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我们在第 1 章里提到,洪堡的观点影响了美国人类语言学家萨丕尔(E. Sapir),后者在谈及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时认为,人们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特定语言(language-specific)的制约。萨丕尔的学生沃尔夫在最大程度上继承和充实了这一观点。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实证研究,沃尔夫借用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一术语,提出了用语言相对论来描述语言、文化和思维的关系。这就是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设”(Sapir-Whorf Hypothesis)。但此假设一经问世,学界就把它作为语言决定思维(linguistic determinism)的错误理论而加以摒弃。只直到世纪之交,语言学及其相关领域学者从他们各自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开始对语言相对论进行了重新审视。在二语习得领域,Jarvis 和 Pavlenko 从各自的长期研究中,认识到语言相对论的合理性,并将其运用到语言迁移研究中来,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概念迁移假设 (Jarvis, 2015; Jarvis & Pavlenko, 2008; Odlin, 2005, 2008)。其实, 语言相对论是语言特有加工的一个特别情况, 它影响和语言加工不直接关联的认知领域, 并予以加工。Odlin 质问道, 假如所有人都赞同 Pinker 所谓的“思想的语言”这一提法, 那么具体语言对思维还有没有影响? 进一步来说, 如果存在这种影响, 又该如何解释? 语言相对性理论承认语言对思维的影响, 但这仅仅是一种理论假设, 并不足以批驳“思想的语言”。事实上, 二语习得领域中的概念迁移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语言相对论个案¹, 该研究成果为不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在思维习惯和认知方式上呈现出的差异提供了大量的数据支撑, 从而证实了语言对思维的影响这一观点, 并对“思想的语言”这一观点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2.3 学习心理学和社会语言学相结合的视角

正如第 1 章所言, 迁移研究长期以来虽然是有关二语学习的研究, 但发轫于接触语言学, 后来二者似乎分道扬镳了。现在人们一般把 Weinreich (1953) 《语言接触》(*Languages in Contact*) 一书看成是当代研究二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研究的滥觞, 但 Weinreich 重点研究的不是学习者在学习另一种语言过程中出现的语言迁移现象, 而是社会上存在的两种或多种语言接触时引发的语言变异和变化现象 (contact-induced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本书第 10 章作者 David Mitchell 别具匠心, 用二语习得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审视发生在 3,000 多年前印度次大陆雅利安语 (Indo-Aryan) 和原始德拉威语 (Proto-Dravidian) 的语言接触现象。雅利安语是一种古印欧语 (Indo-European), 是印地语、孟加拉语等印度的

1 这句来自 Odlin 给概念迁移的定义 (Odlin, 2015: 25): “如果语言相对性常常定义为假设的语言对思维的影响的话, 那么概念迁移可以定义为大都是涉及第二语言的语言相对性的案例。换言之, 概念迁移是二语习得领域里涉及语言相对论的研究”。

近代语言以及早期的梵语来源语言，这一语言词汇里鲜有卷舌辅音。而原始德拉威语是印度其他近代语言（如泰米尔语、泰卢固语等）的来源语言，该语言富有卷舌辅音。大约 3,000 千年前印度-雅利安人从亚洲中部和西部进入印度次大陆和德拉威人发生接触后，可能导致原始德拉威语的卷舌辅音迁移到雅利安语中去，从而造成近代雅利安出现卷舌辅音这一现象。但对这个假设也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近代雅利安语卷舌辅音的出现是其内在的语音变化规则的结果。该章作者采用仪器语音学方法，让本族语为印地语、泰米尔语和其他有卷舌辅音的印度语言的受试重复一个西班牙语本族者的一段录音。众所周知，西班牙语的词汇中也鲜有卷舌辅音。通过收集受试的复述读音并进行音段频谱分析，作者发现受试确实把母语中的卷舌音这种音段音位特征迁移到目标语（西班牙语）的齿爆破音中。这一实验结果支持了语音层面的迁移影响雅利安语语音层面的变化这一假设。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Mitchell 的第 10 章更像是接触语言学（contact linguistics）研究，而不是二语习得的研究。确实，语言接触研究领域对迁移一直颇感兴趣。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营造跨语言影响的社会或历史语境，这和关注学习中语言迁移现象的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取向是不同的。我们之所以把此章列入，意在鼓励二语习得研究者能对社会上语言接触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语言迁移给予更多的关注。既然 Mitchell 可以把二语习得中语言迁移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语言学甚至历史语言学的研究领域，那么为什么属于社会语言学范畴的语言接触和迁移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不可以运用到二语习得的研究中来呢？语言接触是指特定的语言个体或社团同时熟悉并使用一种以上的语言（Thomason, 2001, 2003; Weinreich, 1953）。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语言学家所研究的语言演变都是由语言接触引起的”（Thomason, 2003: 687），而典型的接触性演变就是语言迁移。因此，语言接触和语言迁移研究之间没有一条

不可逾越的天然鸿沟。在西方，好些语言接触研究汲取心理学导向的迁移研究成果 (e.g., Mufwene, 2010; Siegel, 2012); 而有些二语习得研究 (e.g., Helms-Park, 2003) 则善于利用语言接触研究的成果。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 还有一些学者尝试将拉波夫范式¹(Labovian Paradigm) 下的变异社会语言学理论 (variationist sociolinguistics) 扩展到中介语变异研究中来 (如 Bayley, 1991; Dickerson, 1975; Young, 1991; 郭鸿杰 2009 等), 以上研究证实了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模型同样适用于二语习得研究。

二语习得的迁移研究和社会上的语言接触研究的结合, 对我国外语界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我国二语习得研究者长期从事以课堂为中心, 以英语为外语教学的研究, 因此在研究中国英语学习者的语言迁移现象时, 往往不会注重社会上英汉语言接触和语言迁移现象。有人可能认为英汉之间不存在类似欧美社会中的语言接触现象, 也有人可能认为这种研究属于社会语言学的领域。这种研究视角未免过分狭窄。在全球化的今天, 由于互联网等通信工具的迅猛发展, 语言混合现象 (language mixing) 或语码转换 (code switching) 不再仅仅局限于 Weinreich (1953) 所研究的双语社会, 而是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社会和国家间均可以产生语言混合现象。英汉之间语言迁移现象绝不仅仅局限在学习者的课堂里, 而且还大量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我国外语界的语言迁移研究, 完全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社会语言学对语言接触研究的成果来开拓我们的研究视角。这种研究范式将在二语习得研究中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不仅仅有利于把二语习得研究重点从静态的语言之间的对比分析转向到对二语习得的动态变化过程中来, 而且可以进一步丰富语言接触理论和二语习

1 拉波夫对社会语言学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其对变异理论的构建, 而且在于其提出了定量研究的范式, 这是语言研究方法论上的重大突破。拉波夫对于语料收集方法以及对研究结果的解释和预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变异语言学理论最核心的分析框架是变项规则分析法 (variable rule analysis, 简称VARBRUL)。

得理论。

最后,笔者认为,在全球双(多)语语境下,语言接触的相互影响应该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合力关系。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必将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博弈张力中不断发展,并且也会从通晓英汉两种语言的二语习得者中汲取有益的语言养分,而基于语言接触理论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必将为英语本土化特征研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支撑。

2.4 中国元素和迁移的语境补缺假设视角

中国元素是本书的又一大亮点。在组成本书主干的12章里,有6章的作者是学者,占据了半壁江山。这些学者中既有研究二语习得的青年才俊,更有如中国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会专业委员会前会长王初明、副会长蔡金亭、秘书长杨连瑞等国内二语习得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除了上面已经介绍过的李佳等的第4章和李红等的第9章外,李绍鹏和杨连瑞(第6章)运用功能主义框架探讨了语法和语篇迁移;高育松(第7章)运用普遍语法框架对母语为汉语和母语为韩语的英语学习者对于不符合英语语法形式的容忍度进行探讨。此外,在第8章,常辉与郑丽娜探讨了普遍语法框架下英语本族语者在学习汉语论元结构时的迁移,被试在英译汉时频繁使用并过度依赖“使”和其他的使役动词,说明汉语中大量的使动句是英语本族语者习得汉语时的一个障碍。长期以来,普遍语法被用来研究英语句法,常辉和郑丽娜二人一反传统的做法,用普遍语法理论来研究汉语句法,对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最后,王初明教授所撰写的第12章“语境和语言迁移”(Context and Language Transfer)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王初明认为,在外语学习环境中,学习者由于忽视了与外语匹配的语境或不清楚所学的外语形式与何种情景语境发生互动,就潜意识地将外语和母语的语境等同起来,头

脑中已有的母语语境知识自动介入补缺，造成形式与语境的知识错配，出现了“语境补缺”（王初明，2010）。王初明的“语境补缺”理论和洪堡的“over-carry”说法是一致的，二者都承认母语特有的加工或思维对第二语言（外语）具有巨大影响。不过王初明归结为学习者受到的是母语的语境知识的控制，而洪堡则认为是受母语的“世界观”的控制。这二位学者的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讨论很自然让人联想到沃尔夫提出的“束缚力”（binding power）这一非常著名的比喻。沃尔夫认为不同语言背景的人因特定语言的影响，对事物做出不同类型的观察，或对相同的观察行为做出不同的评价（Whorf, 1956）。正因如此，母语在学习者学习和使用另一语言时构成了一种“束缚力”。

认知处理在多大程度上具有语言特定性？这是 Odlin 第 13 章提出的 3 个结论性的问题之一。当然这是开放性的问题，Odlin 本人没有、也不可能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转而拿“束缚力”来说事，指出虽然洪堡和沃尔夫都承认“束缚力”的存在，但就“束缚力”对学习一门新语言的影响而言，洪堡是“悲观主义者”，认为在学习一门新语言时，我们无法摆脱原有语言的世界观；而沃尔夫是位“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了解语言结构或者提高元语言意识有利于二语学习以及对世界的认知，甚至还可以最终摆脱这一“束缚力”。我觉得还可以补充说王初明是位“现实主义者”。根据语境补缺假设，既然母语语境无时无刻不出现在外语学习的整个过程中，说明学习者一直受制于这一强大的“束缚力”。但语境补缺假设同时指出，我们可以积极应对母语束缚，即大量接触正确的外语，这和洪堡的悲观主义有所区别。另一方面，根据补缺假设，“束缚力”的问题并没有像沃尔夫所认为的那么简单，因为母语的制约力量不仅限于语言结构自身，或者是元语言意识的缺乏。王初明明确指出，语境不仅仅只是母语语言知识，语境可分为语言本体语境（属于语言的）、情境（属于外部语境的）、内部语境（属于大脑内部的）和心境（属于心理状态